

语言变异的 概念整合研究

刘毓容 著

语言与社会是一种共变体，语言在与社会的共变过程中，
导致了语言的发展变化，
变化的过程中包含了语言的变异。



四川大学出版社

语言变异的 概念整合研究

刘毓容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项目策划：陈 纯 梁 胜
责任编辑：陈 纯
责任校对：孙明丽
封面设计：优胜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变异的概念整合研究 / 刘毓容著. —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690-2925-3

I. ①语… II. ①刘…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16732 号

书名 语言变异的概念整合研究

著 者	刘毓容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925-3
印前制作	优胜文化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2.5
字 数	23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 85408408 / (028) 85401670 /
(028) 86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前 言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反映了人类的意识活动。因此，语言与社会是一种共变体，语言在与社会共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变化，其中包含语言的变异。语言的变异即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因交际对象、交际范围、交际场合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语言差异现象。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变异，而网络交际的特殊性也决定了网络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

语言认知是以现实为基础，对客观世界产生的主观反应，是基于心理空间的概念化的过程。语义层源于对概念的建构，并通过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表现出来。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促使语言产生变异，并充分体现于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对自然语言意义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语言变异的概念整合研究》从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将概念整合理论巧妙地运用于语言变异诸方面的分析之中，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去探讨语言变异的形式和意义，主要探讨了新时期（1978 以来）语言变异的进程、概念整合的理论基础、语言变异的基本特征、汉语新词与概念整合、网络环境下的语言变异与概念整合、新时期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等。本书的出版对促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目 录

- 第一章 语言变异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001
 - 第一节 语言变异的界定 / 001
 - 第二节 语言变异的理论 / 005
 - 第三节 语言变异的研究现状 / 016
- 第二章 概念整合理论探析 / 029
 - 第一节 心理空间理论探析 / 029
 - 第二节 概念整合的运作机制 / 032
 - 第三节 概念整合与概念隐喻 / 036
 - 第四节 概念整合与概念转喻 / 039
- 第三章 当代语言变异的动力因素 / 041
 - 第一节 语言的本质属性 / 041
 - 第二节 语言内部变异因素 / 045
 - 第三节 语言外部动力因素 / 050
- 第四章 当代汉语变异的特征体现 / 066
 - 第一节 当代汉语语音变异的特征 / 066
 - 第二节 当代汉语词汇变异的特征 / 073
 - 第三节 当代汉语语义变异的特征 / 084
- 第五章 概念整合理论与汉语新词的形成与应用 / 094
 - 第一节 汉语构词法及其发展 / 094
 - 第二节 汉语新词中复合词的形成与应用 / 097
 - 第三节 汉语新词与修辞手法运用 / 107



第六章	基于网络环境下语言变异的认知阐释	/ 113
第一节	基于网络环境下语音变异的认知动因及分析	/ 113
第二节	基于网络环境下词汇变异的认知动因及分析	/ 116
第三节	基于网络环境下语法变异的认知动因及分析	/ 123
第四节	当代汉语语法变异的特征	/ 126
第七章	基于网络环境下语言变异与隐喻转喻理论	/ 140
第一节	网络语言变异与隐喻分析	/ 140
第二节	网络语言变异与转喻分析	/ 162
第八章	新时期语言变异的认知与语言发展趋势	/ 168
第一节	新时期语言变异产生的认知特征	/ 168
第二节	新时期语言变异与语言发展	/ 186
参考文献		/ 192

第一章 语言变异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第一节 语言变异的界定

目前研究语言变异的流派众多，在概念的界定和解释上存在不少分歧，造成了研究对象混乱的现状。我们将在各理论流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反思，重新界定语言变异概念，具体从内涵、性质和研究思路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语言变异的内涵

同一语言要素在系统中有不同的形式，这一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文里奇、拉波夫（1968）首创性研究的贡献在于，他们发现这种现象不是自由的，而是有规律的，即不同形式和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呈现出规律性联系，而且，这种同义异形的现象处于系统共时和历时的接口，从中可以观察系统演变的倾向性，因此，表现出了变异概念的语言学意义。劲松等曾这样评价，“语言变异理论对历史语言学来说，是一种成功的学说，真正把使用语言的人与语言实际结合起来，把共时和历时研究关联起来，使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化为定量的倾向性判断，突破了机械论的结构主义和先验论的生成语言观，具有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劲松、瞿霭堂，2011）。同时也应该看到，拉波夫在后来的研究中，对变异性质的认定有时又比较模糊，没有区分变异和变化，这决定于他们“异质”的语言观。解决语言“质”的问题需要深刻的哲学认识和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劲松、瞿霭堂，2011）曾从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对异质说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异质”语言观混淆了“性质”和“本质”，也缺乏层次和转化的概念，方言之间甚至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不应该被视为变异，这些系统间的差别是本质差异，是变化关系，只有同一系统中语言成分的性质差异才是变异关系。他们将变异看作“‘同义（功能）异形’的‘叠置’现象”（劲松、瞿霭堂，2011），“叠置”的不同形式和相应社会属性及社会功能对应。

这是我们重新界定语言变异的理论基础。综上所述，我们在界定语言变异时，一方面，遵循文里奇、拉波夫（1968）变异开创研究的理论精神；另一方面，对其中不明确的地方给予澄清。

语言变异是指同一空间、同一系统中完全同义同功能的成分由于语言使用者社会属性的不同而发生的并存差异现象，有时简称为“变异”。例如，拉波夫（Labov, 1963）调查的马萨葡萄园岛前元音 [a] 央化变异，[a] 央化变式不仅和说话人年龄相关，而且具有岛内本土身份认同的社会意义。曹志耘（1987）和胡明扬（1988）调查的北京话声母 j、q、x 前化变异，前化变式不仅和说话人年龄、性别相关，而且具有女性娇、柔、美的社会评价。

语言变异具体形式的集合可用语言变项（或简称“变项”）表示，语言变项是一种抽象的结构单位。一个变项总是由一组特定的变式构成，变式是变项具体的实现形式。例如上述北京话女音，声母 j、q、x 是三个变项，每个变项中至少包含两个变式，即标准的舌面音和前化的发音，变项 j、q、x 可以分别表示为 $(te, t'f)$ 、 $(te', t'f')$ 和 (e, f) 。

二、语言变异的性质

语言变异作为有特定所指的语言现象，具有共存性、同系统性、同义同功能性、社会性等性质，这些性质有助于说明和认识语言变异的本质，同时也是认定语言变异现象的有效标准。

（一）共存性

共存性是指某一语言变项的不同变式在系统中同时存在。如果一个变式被另一个变式完全取代而在系统中消失，那么就不再是语言变异而是语言变化。例如，山东明水方言中，老年人保留独立的入声调，而年轻人有的将入声调读同上声调调值，有的读同平声或去声的调值（高晓虹，2000）。北京话中古入声调已经消失，古入声字派入四声，今读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不同调类调值。上述明水方言入声声调现象是语言变异，目前入声调类多个调值共存在明水话中，即同一个人声字可能具有两个或多个不同调值，而北京话的古入声调现象则是语言变化，目前共时系统中古入声字分别进入不同的调类，每一个古入声字都有固定的声调，不存在同一个字有不同声调共存的现象。

（二）同系统性

同系统性是指变异现象一定发生在同一个系统内部。不同系统间的差别体现的是语言变化结果，和变异是不同性质的现象，应该互相区分。例如，现代

汉语舌尖前塞擦音、擦音和舌尖后塞擦音、擦音，有的方言对立，有的方言不对立；在保留入声的方言中，有的有[-p]、[-t]、[-k]辅音韵尾和[-ʔ]喉塞音韵尾，有的只有[-ʔ]喉塞音韵尾；北京话和上海话中都有[ɲ]这个音位，在上海话中，它既可以作韵尾，又可以作声母，还可以单独成音节，而在北京话中，它只能作韵尾。尽管上述这些现象也是以不同形式共存，但它们是不同系统间的差别，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反映不同的历史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是变化的结果。变异是同一个系统中同义的不同形式的共存。因此，所谓的“系统的变异”（如不同语言系统元、辅音比例不同）和“分布的差异”（如[ɲ]在上海话和北京话中的分布差异）（陈松岑，1999）都不是我们所指的变异。我们对“系统”范围的判定具体到某一种特定的话，例如宣化方言依据内部语音特征，可以划分为4个方言小片，每一个小片的代表分别是姚家房话、赵川话、宣化话、深井话（郭风岚，2005）。我们将每一种话都认定为一个系统，观察其中的变异，与此同时，又将宣化话作为更大的系统，观察同一个变项的不同表现，以总结不同的变异类型。

（三）同义同功能性

同义同功能性是指语言变项各个变式的意义和功能完全相同，可以互相替换，语言使用者选择任何一个都不影响基本语义的表达。如果不同变式的意义或功能有差别，那么它们是系统中各自独立的单位，形成互补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例如，上海话韵母(∅, E)变异，在原韵母为∅的常用字和非常用字中，都出现了异读形式E，如“掸贪蛻探男南楠簪沾詹占最醉缀赘展”等（顾钦，2007）。这些字的韵母无论读[∅]还是[E]，都不会妨碍听话人对基本语义的理解，两变式完全等义。

语音系统相对单纯，共存的不同形式是否等义比较容易判定，而词汇和语法变异则复杂一些。目前词汇语法变项在同义同功能的鉴定上还存在很大争议，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四）社会性

社会性指的是不同变式和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相关联，即和文里奇、拉波夫等（1968）研究中的“有序”概念有共通之处。“有序”特指变式的社会分布有规律，如纽约[-r]发音与社会阶层因素和语境语体因素双重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或场合越正式，[-r]出现的频率越高（Labov，1966）。有的同义异形并存现象缺乏社会性，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异读字和异读词，像“血”xuè、xiě，“熟”shú、shóu，“俄”é、è，“颤”zhàn、chàn，“召”zhào、

shào, “弦” xuán、xián 等, 这些不同语音形式可以看作是系统内的固有差异, 不同形式的选择和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没有明显的关联。又如, 常见的一些语流音变现象也是同义异形的共存形式, 但是也缺乏和社会属性的关联, 语流音变完全由结构条件制约, 发生在所有的语言使用者身上。因此, 这两类现象都难以称为语言变异。

同时, 变异社会性的强度在传播过程的不同阶段会发生变化。有的同义异形共存现象起初并不具备社会性, 后来由于某些特定原因和社会因素产生规律性联系, 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在人群中传播, 从而导致其社会性增强; 当社会大多数成员都接纳并使用新变式时, 变异的传播基本完成, 社会性就会减弱。有的同义异形共存现象初期表现出社会性, 和某个社会因素相联系, 但随后并未扩散, 或者消失, 或者只在特定人群中反复出现。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不同的变异类型, 例如, 流行语更新的速度很快, 前几年广泛流行的“郁闷”现在已经较少听到, 年轻使用者觉得它已经过时, 现在喜欢使用更新鲜的“悲催”“冏”“纠结”“给力”, 等等。流行语大多都是在年轻人中短暂地存在一段时间, 然后消失, 被新的流行语取代。又如, 钱伯斯(1995)调查发现, 加拿大安大略南部地区许多孩子把 Z 读为美式发音 [zi:], 但是他们成人以后, 大多数人变读为加拿大及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地方的发音 [zed]。表面看起来, [zi:] 变式和年龄有关, 但这种现象并不扩散, 只固定地停留在儿童阶段。

社会性包含年龄、性别、社会阶层、语体、民族、家庭、社会网络、认同等因素, 其中, 年龄因素在变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共时系统中时间的反映。在变异研究中, 和变异相关的社会范畴被称为社会变项, 一个社会变项由一组特定的社会变式构成, 例如性别变项由“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社会变式构成。

另外, 语言变异还有一项附属功能, 即不同变式表达不同的社会功能, 这是变异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也构成变异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传播的社会动力。例如, 北京话声母 j、q、x 前化变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出现, 当时的调查发现该变异具有女性娇、柔、美的社会评价, 因此, 该变异固定地和年轻女性联系而没有扩散开来(曹耘, 1987; 胡明扬, 1988)。近些年, 大陆与港台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动频繁, 并深受影响。这项声母前化变异和港台腔音色近似, 获得了时尚、新潮的社会评价, 不仅语言使用者的年龄层范围有所扩展, 而且性别也不再限于女性, 男性中也出现了前化变式。因此, 在新的社会背景下, 北京话 j、q、x 声母前化变异获得了新的社会功能, 并有扩散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这项附属功能与变异同义同功能的性质完全不矛盾，因为两种“功能”是不同层级的。“同义同功能”指本体功能，例如上述北京话声母 j、q、x，即使说话人读为前化变式，听话人也不会将 j 理解为别的声母，前化与否的两变式可以互相替换而不会影响本体意义的表达。“附属功能”指特定社会背景下，变式所表达的社会功能或社会成员的评价和态度，类似词汇意义中的色彩义。而且，随着社会变迁，同一变项的社会功能可能随之改变，例如上述北京话 j、q、x 声母前化变异在不同的年代表达不同的社会功能，但是它们的本体功能不变。

三、语言变异的研究思路

语言变异处于共时和历时的接口，从共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起变原因和扩散过程，从历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方向。因此，变异研究应该围绕这些目标设立相应的研究内容，以便充分发挥变异的语言学价值。

我们利用现代汉语语音变异资料进行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理论探索，主要进行以下方面的研究：第一，变异的界定，从内涵和性质两个方面阐明变异的本质，并区分不同性质的相关现象。第二，变异的单位，首先从音类、音节不同层级考察发生变异的单位类型，其次从系统功能角度考察变异单位间的关系，这种共时关系反映出变异对系统演变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三，变异的过程，考察变异在共时系统中的各种传播过程以及不同类型的传播过程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第四，变异的动因，多角度考察变异的表层动因和深层动因，对变异的发生做出解释。

第二节 语言变异的理论

一、语言变异的多重理解

语言变异概念自提出至今，无论在历史语言学界还是社会语言学界都缺少统一的界定，名同实异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无疑不利于变异研究的深入。对于变异的理解，目前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类观点，主要是观察的角度和研究的重点不同。

（一）变异的初始概念

文里奇、拉波夫、赫尔佐格（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王洪君译，

1989)最早提出语言变异概念时,规定这些共存的差异形式具有以下性质。

1. 它们为述说同一件事提供了交替的说法

也就是说,用A说出的每一个语句都有一个用B说出的语句与之相对应。它们提供了所指相同(即同义)的信息,除了选择A或选择B本身所标志的整体意义外,它们没有任何不同。

2. 它们对于言语社团的所有(成年)成员来说都是可供使用的

有些人由于知识、经历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使用A和B说话的能力可能不等;但是所有的人一般都能解释用A和B说出的语句,理解别人选择A和B的用意……这些交替形式和分系统选择,担负着社会的或风格的功能(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 王洪君译, 1989)。

文里奇英年早逝,拉波夫继承了该研究的精神,进一步提出变异包括社会变异和语体变异(Labov, 1966)。20世纪70年代后形成的变异学派,在理论上没有对变异界定做大的改进,其中一部分研究基本依照该观点发现了一些变异现象,还有一些则突破了这一限制。

国内的徐通锵先生(1991)、瞿霭堂先生(2004)等在实际研究中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瞿霭堂先生(2004)明确区别了变化和变异,限定了变异的范围和内容,其界定更加明确和完善。徐大明(1991、2007)、郭风岚(2006)、曾炜(2007)、游汝杰和邹嘉彦(2009)则强调变异的社会性。例如,徐大明(2007)提出“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差异,这一现象即语言变异”,曾炜提出,语言变异“指因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因素而引起的一种共时差异”(曾炜,2007)。这种宽泛的界定容易混淆变异的性质和内容。

上述文里奇对变异性质的看法是后来研究的理论基石,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对变异的界定和性质说明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例如有的研究就把不同的语言(或地域方言)系统看作变异,容易模糊变异的内涵。

(二) 强调语境和应用差异

该类观点认为,语言变异指语言运用中因交际环境改变而出现的各类差异现象。上述变异学派的另一类主要研究为语境差异形成的变异现象。例如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雷可夫(Lakoff, 1975)、约翰斯通(Johnstone, 1990)、厄曼(Ernian, 1993),麦考利(Macaulay, 1985、1991、1997)等人的研究,通过观察各种环境下的话语使用情况,发现性别、社会阶层等社会属性不同的人在某些话语特征或表达方式上有着不同的使用喜好。国内陈松岑《北京话“你”、“您”使用规律初探》(1986)、曹志耘《语气词运用的性别差

异》(1987)、高海洋《北京话常用词社会分层研究》(2003)等都是该类观点的具体研究。还有一类以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语言为对象的研究,例如陈松岑先生认为,“这种不同作家的‘语言’,或不同作品的‘语言’,实际上也是由不同个体之间的语言变异所形成的”(陈松岑,1999)。陈章太先生提出,“从宏观上说,(语言变异)指一个语言社区,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语言社区的语言状况发生了变化……从微观上说,指因为语言使用者的不同,或场合、语境、话题的不同,语言表达目的的不同等,而引起的语言变体,或对语码选择的不同及语言风格的不同等。语言使用者的不同包括性别、年龄、民族、职业、阶层、生活经历、家庭环境、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心理状态、个性爱好、语言习惯等的不同”(陈章太,1991)。后来的多数界定在基本精神上均与其保持一致。祝畹瑾先生认为,语言变异是指“语言运用上的变化和差异,它是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上的变体表现出来的”(祝畹瑾,1992)。陈松岑先生认为,语言变异是指“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者的话语中的状况”(陈松岑,1999)。朱学佳认为,语言变异“从宏观上讲,指一个语言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语言社区的语言状况发生了变化”(朱学佳,2002)。戴庆厦先生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语言呈现出差异或变化,社会语言学家用‘变异(variation)’这个概念来指称自己的研究对象”(戴庆厦,2004)。

该类观点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语言使用状况,缺点在于:第一,不同意义功能的单位可能被当作语言变异,而实际上,它们在系统中各司其职,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例如,“美丽”和“漂亮”,在普通话中意义相近,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使用喜好,但不能因此称为变异,它们仍然是彼此不能完全替代的两个独立单位。第二,过于宽泛的界定可能将一切语言的差别都纳入进来,变异研究难以深入,特别是在已经存在语言混用与兼用、语言转移与替代等专有概念的情况下,无谓地扩大变异所指的范围会影响变异理论的科学性。

(三) 混淆差异和变异

该类观点把一切差异看作变异,忽视了变异必须具有使用者社会属性的控制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体差异。例如,陈松岑先生认为,我们在听到两声“你好”后,能够辨别出一个属于熟人,另一个是陌生人,这种声音的差别就是变异(陈松岑,1999)。

第二,完全受结构规则支配的固有变化,像语流音变。例如,陈松岑认

为，北京话在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等计数词时，还可以说成“一啊[yiǎ]、俩[liǎ]、仨[sǎ]、四啊[sìǎ]、五啊[wuǎ]”，这种差别就是变异（陈松岑，1999）。

第三，次范畴之间的结构功能差异。例如，陈松岑先生认为，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副词不能和名词性短语直接组合，但是“就”“才”却可以，例如构成“就一个球”“才两块钱”或“一个球就”“两块钱才”等组合，这是一种语法变异（陈松岑，1999）。

个体差异具有偶发性特征，而音系中每一个音位实际是依据语言共性归纳出的个人差异的公倍数；结构规则支配下的固有变化、词类次范畴之间的功能差异都是系统固有的，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属性无关。显然，这种变异的概念与变异的原始概念相去甚远。

类似的观点还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规范与变异。例如，陈原先生认为，变异是“表达一种变化，是指语言文字某些变动”“没有变异就没有规范，没有规范也就看不出变异。正是为了规范化的需要才研究变异”（陈原，1988），例如招牌滥用繁体字、社会流行语等。

歧义与变异。例如，陈松岑先生认为，“上课”既可以表示“给学生教授课程”，又可以表示“听老师讲课”，因而是变异；而“他长得真高”这句话对一个正常人说和对一个侏儒说，意义不同，这也是变异（陈松岑，1999）。实际上前者是同形异义现象，后者是用歧，均和语言变异无关。

修辞与变异。例如，张辉的界定具有典型性，“语言变异实际上是作者和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在人的大脑中对言语的内在价值在语音、句法和语义等语言层次上进行特异组合的结果；这种特异组合是人们为了获得一定的交际功能和美学功能，突破规范性语言，在大脑中产生新的刺激，形成新的兴奋点，改变原有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从而产生美感的组合，它同时又受到语境和认知因素的制约”（张辉，2002）。黄得莲在《“变异”出新奇——浅议语言变异的几种现象类型》（1990）中将语言变异分为“谐音”“析词”“易素”“移位”等不同的类型。

以上这些差异现象都与社会语言学中的“变异”概念无关。

二、语言变异的理论流派

基于不同的语言观和研究目标，不同学派对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思路、方

法各不相同。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有七种理论，以下将以提出时间为序分别对其进行述评。

（一）文里奇变异理论

语言变异概念及理论为文里奇等（Weinreich et al., 1968, 王洪君译, 1988）首创。他们的研究目标为，通过观察共时变异，解释语言的历史演变，属于历史语言学的变异研究。他们的理论包含以下主要观点。

（1）语言是异质有序的客体，“异质”指语言“跨领域、跨系统”（王洪君, 1988），“有序”指变异成分和社会因素具有规律性联系。（2）包含语言变异的语言演变理论应该涵盖限制（constraints）、过渡（transition）、包孕（embedding）、评价（evaluation）、起变（actuation）等问题。（3）不同的语言变体在系统中共存，所指相同，社会意义不同，各个变体和特定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规律性联系。（4）语言变异包孕在语言和社会的双重结构中，变异对结构系统的影响是逐步完成的，变异扩散的过程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评价密切相关，语言变异与变化的起变原因需要结合社会行为特点来考察。解释语言变异和演变，需要综合语言结构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在研究方法上，文里奇指出语言变项是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并提出变项规则用以描写语言变项（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 王洪君译, 1988）。

文里奇英年早逝，拉波夫在继承其老师理论精神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本体研究，在部分理论问题上有所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马萨葡萄园岛前低元音变异的调查（Labov, 1963）正式开创了显象时间研究，他假设“当社会和语体因素相对稳定时，不同辈分的人之间的语言差别（显象时间的语言变异）可以反映语言的真实历时发展（真实时间的语言变化）”（徐大明, 2006）。（2）拉波夫将变化过程描写为S形曲线模式，即变化在初始阶段的传播速度极慢，中间阶段速度迅速加快，最后阶段速度再次减慢直至变化最终完成（Labov, 1994）。

总的来看，文里奇、拉波夫、赫尔佐格（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 王洪君译, 1988）的经典研究是变异研究的理论基础，变异和变化的基本原理都涵盖其中。不过，“异质有序”的提法还值得商榷，在文里奇去世之后，他提出的一些关于变异的理论问题并没有获得太大进展。

（二）拉波夫变异理论

变异学派以拉波夫为领导，但是整体来看，他们在研究目标、对象等方面均与文里奇、拉波夫、赫尔佐格的开创性研究（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 王洪君译, 1988) 存有差异,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 在研究目标上, 没有明确区别变异的历史目标研究和一般性研究, 相当数量的变异研究并未以语言演变为背景。(2) 在研究对象上, 范围扩大。首先, 从对象的单位来看, 除了音系变异外, 还包括句法变异和话语变异。句法变项存在语义、功能等不同鉴定标准 (Labov, 1966; Winford, 1996; Lavandera, 1978), 因此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话语变异“指的是特定语境下某一讲话群体在交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口语语言特征”(Macaulay, 2002, 转引自徐大明, 2006)。其次, 从对象的性质来看, 既包括文里奇等人的 (Weinreich, Labov, Herzog, 1968, 王洪君译, 1988) 研究中所指的系统变异, 也包括语言应用因素引起的使用性差异, 例如伯恩斯坦 (Bernstein, 1971)、雷可夫 (Lakoff, 1973)、约翰斯通 (Johnstone, 1990)、厄曼 (Erman, 1993)、麦考利 (Macaulay, 1985、1991、1997) 等人的研究, 通过观察各种环境下的话语使用情况, 发现性别、社会阶层等社会属性不同的人在某些话语特征或表达方式上有着不同的使用和喜好。(3) 对变体社会分布的各种规律和常见模式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 成果丰富。例如, 在变异与言语社区之间联系的研究中, 提出了一致模式和冲突模式两类观点。一致模式的主要代表是拉波夫纽约 [-r] 变异研究 (Labov, 1966), 即同一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者对同一个变异具有一致的选择; 冲突模式的主要代表是米尔罗伊夫妇贝尔法斯特 [th]、[ɹ] 变异研究 (Milroy & Milroy, 1998), 即处于同一言语社区, 甚至同一阶层的语言使用者, 对同一个变异持不同的态度。(4) 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 开创了以社会学知识为背景的多种调查方法, 例如参与观察法、快速匿名调查法、配对语装实验等; 重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 将变项规则和概率理论相结合, 提出变项规则分析法和通用罗吉斯蒂克回归程序, 用以分析调查数据。

总的来看, 变异学派理论扩大了变异研究的范围, 丰富了变异研究的方法, 在对社会变项的观察上更加详细, 此外, 在扩大变异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方面也有贡献。不过, 研究对象、目标却相对模糊, 因此, 一定程度上存在研究不集中、不深入的问题。

(三) 词汇扩散理论

王士元先生 (1969、1991、1993) 提出的“词汇扩散”是包含语言变异的语音演变理论, 不过, 在具体研究中, 他有时使用“差异”字样 (王士元、沈钟伟, 1991), 但所指事实是语言变异。

王士元先生对于“语言变异”的理解和文里奇变异理论相同, 研究目标也

是通过观察共时变异解释历史演变。在后期词汇扩散理论的更新版中(Wang, William S.-Y. and Xhinfa Lian, 1993), 还增加了文里奇等(Weinreich et al., 1968, 王洪君译, 1988)提出的异质有序概念, 将语言看成内在层和外在层共存的系统, 是一个实时变化的动态实体。特别之处在于变异的单位、解释及研究方法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观点。(1) 语音变异的单位是词汇, 语音突变、词汇渐变、语音变异扩散的单位是词汇而不是语音, “每一个词的音位归类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这样, 一个词的音位归类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另一个词的音位归类”(王士元、沈钟伟, 1991), 变异过程的描写是对词和人两个要素的描写, 当所有包含该语音变项的词都完成了扩散, 音变完成。(2) 变异过程中, 词扩散的先后顺序和词本身的使用频率有关, “先变的是频率低的词, 后变的是频率高的词”(王士元、沈钟伟, 1991), 同时还和说话人的心理意愿有关, “当说话人出于某些原因有意要改变原有语音时, 使用频率高的词也就更有机会被改变”(王士元、沈钟伟, 1991); 词扩散的先后顺序和扩散速度有关, “早变的变得慢, 晚变的变得快”(王士元、沈钟伟, 1991), “先变的词对后变的词有加快其变化速率的作用, 变化起点越后的词受到的加速作用也就越强, 因而变化速度就越快”(王士元、沈钟伟, 1991)。(3) 在与共时语言变异相关的社会属性中, 年龄差异可以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 它和性别、行业等社会因素的地位不同。(4) 语音变异的原因有语言接触、生理、声学、表意等因素, 而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指整个社会的语言使用者对变异的熟悉和接受程度)是造成词汇先变慢后变快的原因。(5) 在调查方法上, 使用三字组辨音法观察上海话[a][α]音位合并变异, 根据变异调查的数据利用一系列数学描写可以得到对变化情况的估计。他得到的图像和拉波夫(Labov, 1994)的S形曲线相吻合。

词汇扩散理论和文里奇变异理论几乎同时期提出,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重视包含共时变异的动态变化过程, 因此都是历史目标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词汇扩散理论主要研究语音变化的过程, 而变异理论主要研究语音变化的原因和初始状态。词汇扩散理论虽然也将语言使用者纳入考察范围, 例如在上海话[a][α]音位合并变异中, 王士元等(1991)调查了不同年龄层和性别之间的差异, 但是这种思想并未彻底贯彻, 突出表现就是忽略了人在变异过程中的学习能力和类推能力, 因此, 在变异的单位和方式的研究上还存在可商榷之处。

(四) 徐通锵变异理论

徐通锵先生的音变研究(1986、1987、1991)在国内影响较大, 他以语言历史研究为主, 同时将语言变异纳入研究, 为解释汉语史服务。徐通锵先生